

黑色的七月

陈冠柏



XINDALU

110086

I 25
7434

黑色的七月

陈冠柏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张德强

黑色的七月

陈冠柏 著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42000 印数00011—2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06-1/I·104 定价: 2.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新大陆书系”的一种，收编了报告文学作家陈冠柏近年来创作的十篇力作，包括全方位反映“温州模式”的《东方起动点》；大胆揭露高考制度弊病的《黑色的七月》；描写中外合作企业里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职员的《走向花园酒店》；多视角地表现老年人心态的《夕阳并不孤独》等等。这些作品大都以综合辐射之笔涵盖全篇，气势恢宏，力透纸背。作者不仅善于敏锐地捕捉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且往往切入生活本质作出深刻思考和理性概括，洞悉社会，富于透视力，使作品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引人入胜，又富于思辨色彩，令人掩卷沉思。

目 录

山那边走来的陈冠柏(序)	罗达成 1
东方起动点	9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80
走向花园酒店	108
黑色的七月	144
夕阳并不孤独	174
大饼油条的挽歌	229
绣女梦寻	264
他从田野走来	277
英雄与大话	292
迟到的日出	316
后 记	328

山那边走来的陈冠柏

——序报告文学集《黑色的七月》

罗 达 成

写文章的朋友相聚，总喜欢感情对流，说些快活和不快活的，轻松和不轻松的。

有个知己可以倾吐——无论是男性公民还是女性公民，乃是一种享受和解脱。而无人对话，无人“撞击”，形同没人爱也没人恨一样孤独、可悲。

深圳。风雨之夜。我跟冠柏下榻在现代化的深圳电子集团的一个远离现代化的招待所里——暖瓶里的水，跟服务员不耐烦的口气同样冰凉。但，我们还是谈得兴致勃勃，这彻夜长谈的机会太难得了。

冠柏稍稍有些内向，人多时绝少说话，温文尔雅。跟他“对流”，必须是两个人的半真空地带，他才一吐为快，淋漓尽致。他是个好记者，好丈夫，好爸爸。晚上，他把削好皮的苹果送到靠在床头看电视的妻子手里。而女儿呢，一觉醒来，见他还在挑灯夜战，天那么冷，仍是不顾一切地钻出热被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我给你冲杯咖啡，好吗？”冠柏的心温暖极了。

此番，我们由广州而深圳，碰上了几十年未遇的天气反

常。昨天还热到摄氏三十度，只能穿件T恤衫，今天却下跌到摄氏五度，深圳商场里的鸭绒衫，一夜间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

冠柏的报告文学也是抢手货。他这回来采写的关于深圳电子集团总经理马福元的文章，早已说定是给我的。但出乎意料，同来观光的北京一家刊物编辑部的朋友，被马老板的魄力和魅力征服了，又是提问又是笔记，似乎他也是来采访的。他还强要冠柏的这个稿子。

好朋友的初次相识，并不一定愉快。不打不相识的友谊，大抵比一见如故的要牢靠、深笃。一如恋爱，闪电式的一见钟情，热得快，却也容易冷却，甚至易为“第三者”侵入。

我跟冠柏相识不算早，那场面也谈不上愉快、融洽。冠柏对此耿耿于怀，每每奚落说：“大编辑，冷面孔，辣手辣脚。”

那是1986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在我们《文汇月刊》编辑部。

冠柏是来面谈稿子的。他写了篇反映“温州模式”的《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大题材，不易驾驭，已经请他翻过两次“烧饼”，仍不如意。编辑部的意见一致：文章气势大，触角灵敏，很有些“超前意识”。但材料充足得近乎庞杂，缺少人的形象，缺少成块的画面，有太多的“评论员”色彩，读起来有些累，不怎么感人。

谈判了两三个小时，同义词的反覆。他客客气气地解释，我们客客气气地坚持：写法要作变动，篇幅也要压缩……不知是否有些店大欺客？知道他很希望在南派风格的《文汇月刊》上亮相，毫不让步地逼他修改。

之后，改稿来了。大动干戈，改动得厉害。我们给砍掉几千字，如期发表了。这篇三万字的稿子，把冠柏折腾得好苦：他先后变换了四种思路和笔调，差不多写了十二三万字。

其时，冠柏功夫老到的杂文，已为廖沫沙先生这样的大家所称道。而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还鲜为人知。尽管1985年已得过一回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严格说，他只有半块金牌，那篇大作是跟人合作的。但他跟报告文学界的风云人物，还远非一个档次。冠柏也自我估价道：“二流水平而已。”顺便说一句，我对得奖作者，并不一概钦羡，对某些入选之作，也实在不敢恭维。现今中国的文学大奖，“非文学因素”及作品之外的“讲究”太多了。几乎每届都搭盆菜似地搭出一点不知其奥妙之所在的杰作。

使冠柏捧杯的这篇“大题材”，写的是一位瘦瘦的改革者——很有些“草莽英雄”色彩。我并不怎么喜欢这篇东西。虽说笔走风雷，气势恢宏，但“报告”得缺少文学的魅力。从那文字，那构思，那手法不难看出，它出自熟练的新闻记者笔下，而少有作家的味儿。

由记者而成为报告文学家的，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这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艰难的蜕变过程。很少有人能完成这个质变，特别是白天还得乖乖运行在新闻轨道上的人。

文学容忍放浪不羁，而新闻倡导循规蹈矩。训练有素的夜班编辑，用那支残酷的红笔，不知勾掉多少文学语言的“水分”，在有限的版面上，留下实打实的干货。

冠柏内心似乎矛盾得很，很怕走这苦难历程——他说过：“由记者而至文学，隔着一座山。”却又想走过苦难历程——“但既然同属一个山峰，新闻与文学分属山之阴阳两

坡，登顶并不遥远。”

冠柏有一双扫描和捕捉信息的眼睛，他又逮住一个绝好题材，想写一篇《黑色的七月》，把那些没日没夜、拼死拼活的考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争夺高校入场券的沉重画面勾勒出来。

一人赶考，举家慌乱。一年多前的那个黑色七月，我女儿报考医科大学时，我曾充分领略过那种可喜而又可怕、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

我对冠柏进一步摆脱“新闻腔”，暂时并不抱希望，但对这爆炸性题材却极有兴趣。于是，我们晚上常常通电话。他忙里偷闲，奔命似地采访，跟我说故事，说进展。而我逼命似地催稿。编辑不能太仁慈。

他发烧了，喉咙嘶哑，嘴巴上是“排炮”，却没功夫躺倒——报告文学采访之艰难，大概不亚于七月高考。

稿子终于到了。我一口气读完，大为惊讶：还是这个陈冠柏吗？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他完完全全地换了一副笔墨，题材虽大，但写来细腻，不是大来大去，让人淹没在事件里、过程里、叙述里，也不在文章里进行评论员式的说教了，而是力求展现人的形象和心灵，把一个个块面加以组合和创造，由小见大，由点到面。我不敢相信，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竟有了这样一次飞跃、一次蜕变，他从那苦难的历程里熬出来了——我低估了这位北师大中文系高材生的文学功底和潜在能量。

但他那被我破坏了的自我感觉，仍未修复。电话又来了，没把握地问道：“还好伐？”他用的问号，我用的感叹号：“相当好！”

这篇《黑色的七月》令人瞩目。《文汇月刊》还未上市，

《文汇报》刚发了条二三百字介绍内容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就打电话来了：某某副总理想看看这篇文章……

读了文章，更多的反馈来了。一位老校长写道：“我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读此文时还禁不住热泪纵横。我是因追求升学率有功而升为校长的……干了二十多年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坏事，读了此文，问心有愧。”

他从前的老师、而今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给他的信上感慨道：“这篇特写集中揭露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弊端，令人惊醒！”

冠柏的成功，是碰巧吗——一脑袋撞在报告文学界的大钟上，发出深沉的、惊心的音响？

他用事实回答了。十个月之后，在1987年10月号的《文汇报月刊》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反映老年人心态的《夕阳并不孤独》，副题是“中国的白发浪潮纪实之一”，胃口很大，气派不小。

《夕阳并不孤独》赢得更多的叫好声，它写得比《黑色的七月》还要老到些、潇洒些。

他还在《报告文学》月刊上，发表了非“气势型”的《酒杯托起的海》——它说的是一个在酒杯上刻花的工艺美术家的故事，文字很美，构思很巧。想不到大刀阔斧，以“势”取胜的冠柏，还有穿针引绣花的细腻之招。

一发而不可收。他那个有理论细胞又有文学细胞的脑袋，比我们好使几倍，很难碰的“大饼油条”问题，他居然也能入戏，写成一篇《大饼油条的挽歌》。乖乖，光那个“题记”，文学色彩和理性色彩就闪耀得够厉害了：“这是两个世纪的夹缝间。挑战和机会共存。滋生和消亡俱来。新潮汹涌拍击传统堤岸。传统忧虑地检验未来的包容度。”

在1987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发的那篇只采访了几个半天便赶制出来的急就章《走向花园酒店——对一个中外合作企业里一群中国人的考察》，写得从容不迫，很有深度，毫无仓促落笔之感。他展示了改革新潮中一群人的形象和心灵——一群人的“精神大厦”，如他在开篇的一节文字中所说：

面对这座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如果要考虑它的设施、管理、服务，毫无疑问，只说初来乍到的印象，就可以扛着满意二字归去。可是摄取于表象的东西再好也难免肤浅。我能满意？

对于深层意识的开掘者，花园酒店五光十色的幻景，便越发像座难以觅路的迷宫了。

我感兴趣的是人，主宰这座物质大厦和管理大厦的人，以及他们的精神大厦。我希望存于心中多时的课题在这儿破题——对外开放怎样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人的现代化？

满是现代意识，又满是人情味儿。冠柏再不那样直着略为有些沙哑的嗓门，大声喧嚷了——不知道这跟他做过一次外科手术，把声带上一个息肉摘掉了是否有关？

走了两年，从“山那边”走来的冠柏，终于到“山这边”来收获了——他的洋洋25万言的报告文学集《黑色的七月》的出版，这果实，可谓丰硕。

他走累了，似乎放慢了些节奏，他很懂得一张一弛的妙处。毫无疑问，小憩之后，冠柏又打算向下一座山峰进发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比比皆是，报告文学界的大手笔亦如高山

林立。但愿冠柏成为群峰中雄劲的一座。

搞文学的人，总不安分。年初去广州深圳观光时，我们便很有些流连忘返。不久冠柏便出人意料地从杭州奔向“天涯海角”。他被海南热席卷了，一面办公司挣钱，一面筹建《金岛月刊》。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他表示将不断抛出新作——那是他的足迹，是他的追求，是他的欢乐。

我羡慕冠柏，祝福冠柏，希望这位有才气、有心气、有运气的老弟，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多的崇拜者！

1988年1月，于北京天坛体育宾馆
7月改定于上海爱园二村棚户区斗室。

东方起动点

当我在最后一页文稿上写下温州这个名字，我还不敢说已经十分了解了它。只能用这句话向它道别：我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景象。

——题记

第一章 强反差

我和一个雪发霜鬓的学者在车站邂逅。他刚从他躬身多年的研究点苏南折过来。时已盛夏，他的哗叽裤和船式皮鞋还把春天留在自己的装束里。看得出他转移时很有点急迫。

“去哪？”

“温州！”

问及汽车这个“行进空间”上的成员，几乎大半不是“原乡人”。但一提到此行目的地温州二字，每个人的情绪就立刻像砑入穴位一般激奋起来。不休的话题中是一连串仿佛发生于另一世界里的传闻、疑案和怪诞传奇。似乎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团迷雾。

当迷雾未解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好奇与迷惘，钟情注视

着身边的一切，就像我第一次走在温州大街小巷时的情形。

我为这里市场的喧闹与多彩而惊讶。五马街，可以称作温州的王府井，又不知比王府井繁华多少。国营商店和个体商摊用连绵彩灯把这里串挂成不夜天。挨个儿排开的小吃铺好多是通宵达旦的。午夜后的饭铺酒肆依然坐满了顾主。五颜六色的塑盆、箩筐里，蟹蛭蛎蛤鱼虾跳（鱼），参蜆貍蛙鳖鰻鼓（鱼），肉菜蛋豆菇耳蔬，干鲜冰活咸生熟，五花八门，要啥有啥。这番热闹劲儿叫你分不清到底是买的人多还是卖的人多。

任何名牌烟酒都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买到。青岛啤酒、茅台、西凤，“大中华”、“红双喜”，白色“云烟”，红壳“牡丹”，像是闯进了烟酒博物馆。一位国宴主持者好奇奇怪：“从哪冒出来的？人民大会堂也搞不到那么多。”

街上很难发现两个衣服重样的姑娘。服饰充满个性。听说许多姑娘发现自己的穿戴和别人重了，会悔不迭地往箱底塞。

走进木杓巷小商品市场。我怀疑到了深圳沙头角、九龙女人街。正是从这条小巷涌出了五彩缤纷的队伍。

占据这个小巷市场中心地段的是臊臭难闻的厕所。

两位施以淡妆、挂有项链的时髦姑娘，用小扁担抬着油漆剥落、仿佛是外婆时代启用的马桶，轻晃着过巷。粪臭伴着化妆品摊上的法国香水，搅合成一股说不清的异味。

从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我的所见所闻就像一个打乱了的几何体，块状、圆状、线状……红色、粉色、白色……在你面前旋转，旋转，旋得你眼花缭乱。

我困惑。

温州人对我说，他们的产品可上天、入地、下海，有人没人的地方都要去转三圈。

我信了。

西南卫星发射基地。控制卫星升空的计算机房有个关键部件产自温州街道小厂。

西北某地质石油钻探基地。钻机的电器开关、钻探工的夹克工作服、兜里的工作证、塑质饭菜票以至幼儿园的塑料七巧板，都是温州货。

可是两位同窗旅客的上海采购员却忙不迭地向我诉苦，温州产品质量太次了。还有假、冒、骗的。全国查获的数十万冒牌“凤凰”、“永久”自行车的商标，有一半是温州的“杰作”，这也是事实。

刊载：东海虾峙外海区，新修的渔轮翻沉海底，三十三名渔民无一生还。祭悼亡灵的惨人恸哭和着烧纸的灰烟，三日不绝。船体沉漏的直接原因，是精接板缝的桐油是假的。它也出在温州。

听说有三位拥有二十万元资金的专业户跑到温州来开记者招待会，下面有两位“看官”大不以为然：“甩毛灰，二十万就跑这儿开来啦！”那他们有多少呢？一个难以搞清的未知数X。这是富起来的人在说话。

穷的山区还有的光屁股。有的地方妇女不敢出来“结扎”，据说是因为没有一条足以蔽体的裤子。这是贫困县的一位秘书在上报材料上说的话。

当叮叮当当的家庭工厂把清冷小镇连成个闹市，有句民谣流传开了“搞供销的是天兵天将，搞家庭工业的是杨门女将，搞农业生产的是虾兵蟹将。”

而另一位在全国率先领导农业责任制的高层领导人驱车路过荒草覆盖的农田，特意下车，痛惜地走过田垌，似在呼唤一个古老的声音：“田园将芜，胡不归！”

高楼屋宇的背后，常常有供奉神祇的庙堂同时立起。

基督教的十字架又不可避免地和灶王爷在一个院里“和平共处”。

我曾经在渡船经过十里水路的途中，亲眼看到毗邻的两个门口，褪色的春联依然高悬。一边是：“致富全靠三中全会，幸福不忘一号文件”，横额“知识万能”。另一边是：“钱如东海浩大无边，利如潮头滚滚而来”，横额“上帝赐福”。

我又曾看到，披麻带孝的浩浩送葬队列，由一色大檐帽、白制服的管乐队开道。反来覆去吹奏的两支乐曲断然不属哀乐范畴；《妈妈的吻》和《十五的月亮》。……

我哑然。

……

这就是我要访问、拜识、解剖、探求、书写的地方——温州。仿佛世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这块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了。它的每一缕空气都给我带来难以摆脱的刺激感。

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北京，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京。那是什么？

它是温带和亚热带的交割点。东濒东海，南接福建，西南山峦起伏，东北旷阔平野。但这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呢？

我折服于它的繁荣光色。恐惧于它的纷乱驳杂。

极有思考意味的是，正是在这块充满强反差的土地上，土生土长地产生了被称作“温州模式”的农村经济发展独特格局。我到温州时，一场由国内百十位专家参加的“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刚刚结束，四十余篇论文广为复印，又有“温州纸贵”之势。

希求揭开温州这个谜的，远不止这个小范围的理论探讨。前来温州的崎岖公路上（除了水路，唯有漫长的公路线与之沟通。温州人日盼夜梦，有条铁路，并尽早开辟航空港），大车